

• 话题聚焦：“一带一路”与中外交流与合作 •

## 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 联系：历史与想象<sup>\*</sup>

咎 涛

**【摘 要】**土耳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中国进行着彼此的形象建构，留下了宝贵的丝路遗产。尽管中国和土耳其也曾因为文明、技术和地理的因素而远离彼此，但中土双方的交往历史对当前中土认知互构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土耳其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伙伴国家。

**【关 键 词】**中土关系 认知互构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咎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近年来，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中“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就成为特别突出的关键词。<sup>①</sup>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追溯和发掘历史上沿丝绸之路发生的交往与交流关系也就成为某种“时尚”。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无法就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实际发生的历史关系做详细的追索，而是打算从观念史的角度，围绕“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侧面，考察和

\* 本文系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教育基础科研项目“土耳其的欧亚主义”阶段性成果。

①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搜索关键词“丝绸之路”，得到近几年的数据。2011年共有记录696条，2012年共有742条，2013年则有1406条，这是一个明显的增加，细考起来，这个增加主要是在2013年9月之后，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之后。在2013年9月7日~12月31日这个时间段中，以关键词“丝绸之路”检索中国知网得到857条记录，也就是说，这不到4个月时间的记录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数值，之后的数字更是实现了飞跃式增长，2014年的数据是5049条，2015年是7236条，2016年是4673条。若以“一带一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2014年的数据是986条，2015年是14070条，2016年是11658条。以上数据系根据<http://epub.cnki.net/grid2008/index/ZKCALD.htm>进行检索，最后检索时间是2017年4月22日。

分析土耳其与中国对彼此的形象建构。<sup>①</sup>

“历史与想象”所对应的分别是史实/事实与观念/建构。从哲学的角度说，对于何为真实或真相有着众多不同的解释，笔者无意纠缠这一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存在两种值得研究的“现实”：具体存在的事物或者在特定时空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物与事件）；想象中的现实（神、国家等）以及人们如何书写、记载、记忆、评价具体存在的某种现实（即所谓事实背后的观念）。前者或可称之为客观现实，后者或可称为主观现实。就人类历史而言，主观的或想象的现实已经变得日益重要。<sup>②</sup> 本文的“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侧重于主观现实层面，也就是更加侧重关于现实的理念、想象及建构这个维度。

## 一 背景：并不陌生的突厥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突厥/土耳其要么在时间上属于一千多年前的过去，要么在空间上是西亚/中东地区的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说，突厥/土耳其在时空上与我们存在较大的距离。然而，历史地看，在过去显然并非如此。突厥是中古之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古代中国对突厥事迹的记载于近代以来的社会而言，除了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之外，还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认知建构无不涉及关于古代“突厥”的知识。

关于“突厥”一词在中文正史中的最早出现，通常的说法是出现于隋唐时代。涉及突厥的正史多成书于唐代（见表1），从唐人所撰史书的行文中不难看出，隋唐之时，突厥并不是一个新近为当时人所了解的群体。网上有一个说法是“突厥”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540年，但不知所据为何。据岑仲勉先生考

① 就本研究的主题而言，它更多地涉及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认知建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从中国方面来说，陈鹏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6月）对前人的研究最具综合性且资料最为翔实，笔者本文中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的一些资料就得益于陈博士此文提供的线索。从土耳其方面来说，穆斯塔法·塞尔达·帕拉博叶柯（Mustafa Serdar Palabıyık）的文章“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ilig - Turk Dunya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Number 65, March 2013）是近代土耳其人之东亚观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此外，笔者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史观以及当代中土关系的研究中也曾部分涉及双方对彼此的认知问题，参见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三联书店，2011；咎涛：《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4期，第59~66页。

②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3页。

证,“突厥最初见,且有年份可考者”系《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大统〕八年(542),〔宇文测〕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sup>①</sup>。学者多从此说。从时间、事件、人物关联的角度看,确实,这里的542年与“突厥”之事对应,算是一个比较早的年份了,此亦是确切年份上能够找到的与突厥对应的最早记录。当然,仍需考虑到《周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这一情况。《魏书》的成书时间为公元551~554年,但其《西域传》等部分早已遗失,现在我们所见之《魏书·西域传》系后人据《北史》增补的,尽管《北史》也曾参阅《魏书》,但其中的细节目前已经不可考。<sup>②</sup>故魏良弢将“突厥”一词的最早可考年份定在公元542年<sup>③</sup>,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尽管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该词进入汉语世界的时间应该还会更早,但可惜并无确切的文献证据。<sup>④</sup>

表1 涉及突厥记载较多的汉文典籍

书名	作者	成书朝代	成书年份	备注
魏书	魏收	北齐	—	《西域传》亡逸,后人据《北史》补
隋书	魏徵	唐	629	《列传第四十九·北狄》中的突厥、西突厥、铁勒、奚、契丹相关记载
周书	令狐德棻等	唐	637	《列传第四十二·异域》中记载了突厥、吐谷浑等
北齐书	李百药	唐	636	无专门记述,但多处提及突厥事
北史	李大师、李延寿	唐	659	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
通典	杜佑	唐	801	《边防十三·突厥上》《边防十四·突厥中》《边防十五·突厥下》
旧唐书	刘昫等	后晋	945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上》和《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下》,与《通典·边防》十三、十四、十五记突厥事基本相同
新唐书	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	北宋	1060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①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58,第15页。
- ② 参见《魏书》,中华书局,1974,“出版说明”及第2282页“校勘记”。
- ③ 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
- ④ 岑仲勉先生也说,《周书·宇文测传》中提到,以往面临突厥来寇掠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那么,“突厥之兴,更可上溯于魏也。”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15页。

公元 630 年，著名僧人玄奘从高昌出发一路向西。不久，玄奘以极大的代价翻越了凶险的天山，进入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并在那里拜访了西突厥可汗——肆叶护可汗。当时，西突厥汗国对从高昌到波斯的广阔地区行使有效的控制和管辖权，在规劝玄奘留在碎叶不要再前往印度失败后，肆叶护可汗赠给玄奘 50 匹绢作为盘缠，还给他配了一名翻译，并为玄奘写了数封国书给沿途的统治者。之后，玄奘又向西到达了撒马尔罕<sup>①</sup> 并从那里往南行走，最后抵达了印度。从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西）突厥在当时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是在玄奘面见西突厥可汗的这一年，唐太宗大败东突厥。对于突厥人在内陆亚洲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性，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史书还是后世的学术研究，都没有太大的异议。突厥汗国曾与强盛的隋唐帝国并立争雄，对于后世突厥与不同民族的历史叙事而言，这一段历史必然要被浓墨重彩地书写。与此同时，从历史记载的丰富性来说，中文材料也成为重构这一时期突厥汗国历史的最重要支撑。《旧唐书·突厥上》开篇就说“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sup>②</sup> 当代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图逸姍教授（Isenbike Togan）在其为《旧唐书·突厥列传》所做的土耳其文注疏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与突厥人历史有关的作品中，都会提到中国文献对突厥历史的重要性”<sup>③</sup>。

然而，诚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教授所言，中国史书的记载侧重于东突厥汗国，而与中亚和西亚历史关系最密切者可能还是西突厥汗国。但为了满足突厥叙事的“完整性”，现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世界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在民族主义盛期还是其后）统统都要追溯到东突厥帝国（也就是以阿尔泰山为发祥地的古代突厥）。在罗教授看来，“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ü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 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乌古斯九姓，就不是 Türk”。不管后来的人们如何分类，

① （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第 145～147 页。

② 《旧唐书·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第 5153 页。

③ İsenbike Togan, *Çin Kaynaklarında Türkler, Eski T' ang Tarihi*, Açıklamalı Metin Neşri,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2006.

“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sup>①</sup>

一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倾向于把匈奴人直接当作最早的突厥人,把公元6世纪建立的“蓝突厥帝国”(Gök Türk Empire)看成最早的突厥帝国。但研究早期的“蓝突厥帝国”历史的学者伊珊(Ishan)说:“他们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因为6~7世纪的中国史料描述的是不同的神话。他们或许曾是匈奴的一部分,他们或许曾是突厥化的、逃避拓跋魏迫害的鲜卑人,抑或是突厥化的印欧人。无论他们是谁,反正他们是最早使用突厥这一名号的群体。”<sup>②</sup>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把占据着俄罗斯南部以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地带的古代民族统称为“突厥-蒙古人”,“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sup>③</sup>东方学家们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认为,匈奴人与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崇拜天(腾格里),都以狼为图腾。<sup>④</sup>目前似乎可确认的是:“突厥族一度属于阿尔泰人种的一个部分,同属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族等。”<sup>⑤</sup>伯希和的看法是“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匈人(Huns)。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匈人属于突厥(Turc)系,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但尚不能加以解释。”<sup>⑥</sup>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但不能说匈奴或匈人联

① 罗新:《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载《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81~82页。

② Ishan, “The Gök Türk Empire,” [http://www.allempires.com/article/index.php?q=The\\_Gok\\_Turk\\_Empire](http://www.allempires.com/article/index.php?q=The_Gok_Turk_Empire). 突厥语“gök”有“蓝”“天”的意思,在现代土耳其语中一般指“天”。根据苏联学者伯恩斯坦的看法,在6~8世纪,“突厥”一词本质上没有全民族的意义,而通常指突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因此,碑文中提到“突厥”时常加形容词“gök”,按照原文的意思,“蓝突厥是对上层统治者的形容词”,“gök”在古代突厥碑文中是表示高贵的形容词。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4~25页。

③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黎荔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27页。

④ 关于狼图腾在突厥-蒙古人之间的早期传说,可以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载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74~299页。

⑤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第18页。

⑥ 根据最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Türk”这个词在历史上有很多种含义,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关于该词的解释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意思是“诞生、出现、增加”;另一个意思是“力量、强大的、有力的、成熟的”;而“突厥”一词作为一个政治名称,最早指“蓝突厥国”(Göktürk Devleti, 552~740)。参见Tarih, Lise-1, Istanbul: Milli Eğitim Basımevi, 2002, p. 38。又据薛宗正的研究,“突厥”一名西魏译自茹茹对突厥人的称呼,习久沿用,遂成定译;突厥一词本有“帽”的含义,据此,薛氏推测“Türk”的来历似与古塞人的族称“锐帽人”(Tigra-hauda)有关,“tig”有“锐”的意思,它进一步音变为“Türk”,则有“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薛宗正《突厥史》,第77~78页。

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的成分。”<sup>①</sup>

上述现象显然很符合“历史与想象”或“史实与建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在有了一个大致突厥历史和人群之概念的条件下，如何来叙述或建构它们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因为历史记载的关系而被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古代的强盛王朝（尤其是隋唐）与强盛的突厥帝国在同一时空下竞争，且汉文史料对此记载颇多，那么，中国的王朝和历史记载就成为后世突厥与不同民族历史包括西方学者叙述的所谓完整的“突厥/土耳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至于中原王朝如何看待突厥，我们需要将这个问题置于传统中国的夷狄观念和华夷秩序观下来理解。<sup>②</sup>

我们不能说唐以后的中国人对突厥已经没有印象，但搜索正史，五代以后很少发现新的记载。突厥在那之后主要是在叙述其他民族起源时会被提及，如提到契丹的时候。在宋以后，突厥主要是在谈论隋唐历史的时候作为一个同时代的参照而被提及。但总而言之，由于长期在内陆亚洲历史上的直接接触，历史上的中国人与突厥人之间相互并不陌生。同样由于中国方面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的存在，之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突厥之人与事并不陌生，到了近代，因为有着“同病相怜”的相似境遇，突厥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关联又将被重新激活和演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及和类比。

## 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土认知的互构

到了清末，随着中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开始重新将突厥（奥斯曼帝国）作为重要的时代参照和对应物提出来。1898 年 6 月，康有为作了著名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其中康有为先点题说突厥与中国命运相近“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sup>③</sup> 然后，康有为强调中国和土耳其是同种“突厥出自匈奴，盖殷人淳

① “伊兰人”是公元前几世纪时生活于南俄草原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上的印欧种人，其中有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俄〕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和等《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 177～178 页。

② 拟另文论述。

③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第 298 页。

维之后,而吾同种也。昔在隋唐之世,赫然控北方数万里,亘自远东,延瀚海至于里海,奄有中亚,自蒙古前莫比强焉。”<sup>①</sup> 根据学者的研究,早在康有为撰写《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之前,徐继畲就在其《瀛寰志略》中将英文的“Turkey”译为“土耳其”,且以此音译为最正,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规范用词。康有为非要舍“土耳其”而用“突厥”,其原因在于康有为跟当时的革命党人都看重奥斯曼帝国的镜鉴意义。革命党认为土耳其与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可谓“同形”,又同样遭受深重的外患,可谓“同病”。而康有为不只关注“同病同形”这一面,他更强调的是“同种同类”。康氏曾经很推崇《泰西新史览要》一书,正是该书提到,土耳其国“即唐书所称之突厥也,历代相传仍其本名,乃近年来华人之译书者不明古史,误译作土耳其”。这便是康有为在1896年后用“突厥”对译“Turkey”的原因。比较来看,古代正史中史家强调匈奴/突厥在血统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建立某种谱系上的联系,从而使中原人陌生的对象不再陌生,也不再恐惧之,以利于经略;但康有为在这里强调的“同种”,目的是拉近两个比较对象的距离,使比较更有切近感。<sup>②</sup>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伊斯坦布尔的游记就名之为“突厥游记”也就不奇怪了,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康有为才启用“土耳其”一词。<sup>③</sup>

对康有为来说,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问题相似,双方又是“同种同类”,这种情况是“鉴戒最切者”。对康有为而言,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中国有相同的命运,都是亚洲的“病夫”:没有机器,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好的路,没有铁路,同样地无知,没有现代世界知识,没有人权,没有议会,没有法治,没有独立,都深陷危机。<sup>④</sup> 康有为为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了一种同病相怜的“自家人”的感觉,“中国与突厥乎,西欧久谓为东方两病夫矣,其意谓未知孰先死也。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臣编译突厥事,窃窃自危,旁皇泪下”<sup>⑤</sup>。

相对于改良派提倡君主立宪,革命党人同样也以土耳其的例子来论证中国之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98页。

② 20世纪30年代,仍然有学者翻出唐代安置东突厥一事,论述土耳其与中国之同种。

③ 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99页。

⑤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300页。

不可能实行立宪，而欲行立宪必先进行种族革命。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汪精卫就谈过这个问题：

夫中国之政治现象，与土耳其不同，故土耳其犹可言君主立宪，而中国则必不可，以民族问题为之梗也。此其故吾昔常言之矣。曰：“土耳其国内诸民族，以突厥民族为大多数，今之握君权者，固突厥人，而为革命之主动者，亦突厥人也。故君民之际易于调和，及得宪法，而目的已达。若中国则不然，握君权者为满洲人，而乞求立宪，则汉人，非满人也。此大异于土之以革命得立宪者矣。土之革命，突厥人为主动，而马士多利亞人赞同之。马士多利亞人之意，欲以少数民族附庸于多数民族以自存也。今汉人宁能附庸于满人以自存乎？故以汉人所处地位计之，当如希腊人之谋独立，乃为合于正义。希腊以文明民族，而被征服于土耳其，与汉人被征服于满洲同也。希腊民族受土耳其压制之时，知谋独立，不知望土之立宪，惟其民意如是，故终有独立之日，此实与现时中国之革命党，同一心事，而亦中国人所当同趋于此一途者也。不惟希腊而已，卜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绵利亚人、罗美尼亚人、孟颠匿古鲁人，其以异族受制于土，与希腊同，而其谋独立，亦与希腊同，是可谓能尽民族之天职者矣。中国人对之，其知愧乎？其可自同于马士多利亞人乎？”<sup>①</sup>

汪精卫所谈的背景是 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

就在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纵向求诸历史、横向对比自我与他者，建构起一个“同病同形”“同种同类”的突厥/土耳其之时，奥斯曼帝国也与中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先是在这之前接待了阿古柏的信使，并册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此为对中国国家主权之直接侵犯，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野心，这一情形为当时的中国大臣所知悉。另外，20 世纪初也有一些土耳其人来到东亚，留下了他们的观感，向其国内报告了东亚的情况，这其中就有他们关于中国的具体看法。

<sup>①</sup> 《汪精卫集》，光明书局，1929，第 201 页。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奥斯曼-土耳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与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皇帝哈米德二世建立了联系,接受其册封。这一关系反映了泛伊斯兰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也就是帝国开始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拉拢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穆斯林,以反帝反殖为名,实际上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威。与此同时,在中国方面,正在进行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李鸿章和左宗棠也注意到土耳其对新疆问题的介入。1874年,李鸿章就通过外国报纸和探子得知了这一消息,并在《奏陈方今天下大势及分条复陈练兵造船筹饷各事》中向皇帝汇报了此事,他说“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sup>①</sup>左宗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在奏议中谈到“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闻见。果如新闻纸所言,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问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左宗棠认为土耳其不足为虑“至土耳其,即都鲁机,国于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非复寰宇中央之旧矣。”左宗棠其实也意识到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与回民之间的关系。<sup>②</sup>奥斯曼-土耳其人对阿古柏的支持成为后世中国人关于土耳其利用“双泛”在亚洲内陆推行扩张主义、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历史阴影。1933年,分裂主义势力在喀什噶尔组织“独立政府”,国人对于其背后的土耳其因素的认知就更加清晰了。至此,近代土耳其人利用“双泛”干预中国新疆事务的负面形象已然成形,且影响至今。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头十年,有些土耳其人旅行至东亚,据认为其中就有奥斯曼政府派出的间谍,他们在新疆办学,宣传泛突厥主义,有的被中国政府抓捕和驱逐。这些人也留下了一些游记类资料,其中他们描述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除了记述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游记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示出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如何看待东亚。简单来说,当时的奥斯曼-土

① 李鸿章《奏陈方今天下大势及分条复陈练兵造船筹饷各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载《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0卷),第5页。

②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载《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岳麓书社,1987,第191页。

耳其人非常赞赏日本，同时非常鄙视中国。他们认为日本人是好的穆斯林，是东方国家的榜样，因为它既现代又保持了传统；而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是肮脏和贫穷的。他们指出，日本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是穆斯林，但日本很容易变成伊斯兰国家。

奥斯曼－土耳其人赞赏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了解到也看到日本人实现了国家的进步（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现代化）和强大，日本甚至打败了曾经强大的中国（1894年）和俄国（1905年）；二是日本人非常文明，尤其是很讲究卫生，为人彬彬有礼，非常讲究生活的细节；三是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己的传统，不管是在服饰方面还是习俗方面，日本人仍然珍视自己的传统。这几个原因，使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非常羡慕日本人，而且从穆斯林的立场对此进行了阐发。

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除了认识到它的先进、强大与文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把日本视为黄种人的骄傲，视为东方人和亚洲人的骄傲。同样面临列强压力，同样追求现代化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对自身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但是并没有获得日本那样的进步，尤其是感觉到帝国的问题重重，要达到日本的高度，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实现的。但是，作为自我定位在亚洲和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群体意识，那就是东方人的落后与西方的进步使东方民族普遍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东方人面临失败和灭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人必须团结起来。这种团结，最初是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即团结所有的穆斯林，进行圣战，对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了日本，就顺势把日本当成东方人的领袖，认为只有日本有能力带领东方人走向进步并战胜西方人。

对这些土耳其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内在地具有一种本质主义的东方性的视野，即东方注定是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民族可以像日本人一样通过学习西方，变得更为强大，但不一定必须成为西方那个样子。土耳其人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希望：一个是日本突破了中华文明的世界秩序，这是它本来就隶属的那个世界，日本对其完成了突破和超越；另一个是通过日俄战争，作为黄种的、亚洲的和东方的日本人，战胜了白种的、欧洲的和西方的俄国人，这对土

耳其人来说,更是欢欣鼓舞的,日本以实践证明,东方超越和战胜西方是可能的。

关于中国,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记载和断言。普遍的感受是,中国大而虚弱,中国人多而散漫,没有法治,尤其是中国人非常脏,不讲究个人卫生,卑琐又不懂礼貌。这些都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材料中,他们对中国不抱希望。<sup>①</sup>

1923年,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土耳其在中国声名鹊起,因为中国正日益陷入军阀混战和分裂主义,土耳其的独立和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的榜样,也有不少先进的中国人时时拿土耳其做参照谈论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土耳其完成独立革命并在国父凯末尔领导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建设现代国家的时期。中国人对于凯末尔的崇拜与宣传是不遗余力的,出现了多本(篇)研究、介绍凯末尔的专著和专文。1922年,《民国日报》就发表过一篇诗歌《祝基玛尔将军胜利》,讴歌凯末尔的丰功伟绩:

上帝底默佑哟!  
亚伯拉罕底默佑哟!  
至圣穆罕默得底默佑哟!  
胜利! 胜利! 胜利!  
弱小民族底胜利!  
基玛尔将军底胜利!  
世界上的弱小民族,  
赶紧团结起来哟!  
弱小民族底血,  
经得起强梁的唇吻底吮吸吗?  
何不把我们弱小民族底血合洒起来,  
洪水般的血,

<sup>①</sup> 以上论述参见 Mustafa Serdar Palabiyik, "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ilig - Turk Dunya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Number 65, March 2013.

也许淹死得一部分强梁的野兽吧！  
我们都愿做基玛尔将军底马前卒哟！  
弱小民族万岁！  
基玛尔将军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sup>①</sup>

从这首诗歌不难发现，中国以土耳其为榜样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同认为是弱小民族。土耳其独立革命的胜利令处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之中的中国先进人士感到羡慕，甚至萌生了效法和追随土耳其以谋自强的意念。

中国知识分子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对土耳其革命和变革保持了密切的关注。一直以来，在中国也有一些对土耳其民族独立艳羡不已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历史学家表达了对“新土耳其”的敬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柳克述撰写的《新土耳其》。<sup>②</sup> 关于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林被甸、董正华曾提出：

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该书洋洋 30 万言，完整地记述了亚洲另一个曾经被称为“病夫”的老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统览全书，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反映了在“中体西用”论之后，主张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所达到的一般认识程度。<sup>③</sup>

① 恶石 《祝基玛尔将军胜利》，《民国日报·觉悟》1922 年第 22 期。

② 柳克述 《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6。

③ 林被甸、董正华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

出于与柳克述相似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论著<sup>①</sup>。比如,1928年,程中行编译了《土耳其革命史》一书。程氏在该书的“译者自序”中说“数年以来,国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国人但忧吾国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协赞成功之原则。是书本旨,虽在铺陈土耳其革命之事迹,而国人读是书者,不可不于其成败之点,反复三致意焉。”<sup>②</sup>1948年,边理庭编著了《新土耳其建国史》,在该书第一部分,作者就论证土耳其是黄色人种,其用意很明显,“我们说土耳其民族,乃是黄色人种的血胤。黄色人种在亚细亚洲的东西两端,建立了两个大国家——中华民国与土耳其,东西辉映,为世界人类生色不少。为黄色人种尤其生色不少”<sup>③</sup>。限于篇幅,其他著作不赘述。

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刚刚结束的背景下,本着对“帝国”“民族国家”之命运等问题的思考,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撰写了两篇有关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论文<sup>④</sup>。在这个时期,陈先生还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sup>⑤</sup>。在序言中,陈先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奥托曼-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委实太相似了,它历史上的每一个困境和转折,都值得我们仔细思量 and 反省……而且,奥托曼-土耳其的启示并不限于过去,也涉及当前和未来”,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一个长期在摸索中前进的民族产生兴趣与了解,并且在比较与反思中吸取教训”。<sup>⑥</sup>

80年代末以来,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有关土耳其近现代史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的主导下进行的。在罗荣渠先生的指导下,北京大

① 关于中国人对土耳其革命与改革的研究史,可参见董正华“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in Ankara Üniversitesi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ed., *Uluslararası Konferans: Atatürk ve Modern Türkiye*, Ankara Üniversitesi Basımevi, 1999, pp. 669-675。

② 程中行编译《土耳其革命史》,民智书局,1928。

③ 边理庭编著《新土耳其建国史》,独立出版社,1942,第6页。

④ 陈方正《毁灭与新生 I——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历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7期,第102~118页;《毁灭与新生 II——土耳其的威权体制与民主历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9期,第77~92页。两文亦见于陈方正论文自选集《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89~126页。

⑤ 这两本书分别是:伊兹科维兹著《帝国的剖析》,韦德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美〕戴维森著《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⑥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学历史系的董正华先生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董正华在该文中认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sup>①</sup>他还认为“凯末尔和土耳其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反响，不应当一味地以土耳其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解释，而应当从落后国家如何成功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sup>②</sup>此外，还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彭树智先生及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黄维民等所做的工作<sup>③</sup>，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sup>④</sup>，等等。这些比较新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脱离“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也没有超出前述土耳其和西方学者的关注范围，往往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

反观历史，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于土耳其作为中国的榜样，左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看法。蒋介石想做中国的凯末尔，民族主义者呼唤中国出现一个凯末尔。<sup>⑤</sup>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李维汉、恽代英等都赞扬过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独立革命，将其视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强调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认为同为“病夫”的中国人民应该学习土耳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独立与复兴。<sup>⑥</sup>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土耳其革命性质的深入认识，尤其是凯末尔党人迫害土耳其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转而批评土耳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没有改变劳苦大众的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共及左翼人士对于凯末尔革命的批评逐渐升级。

1924年，瞿秋白就对凯末尔革命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凯末尔党人消除了原先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因素，完全走向了资本主义。他首先指出，在革命初期，土耳其的革命运动利用了左派的哈勒党和共产党，表面上与他们进行合

- 
- ① 董正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36页。
- ② 董正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第362页
- ③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
- ④ 肖宪等《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⑤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把蒋介石视为土耳其之凯末尔者大有人在。
- ⑥ 黄志高曾经撰文讨论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问题，认为中国与土耳其的同病相怜及凯末尔革命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均促使中共高度关注凯末尔革命。但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又反映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与孙中山合作的战略意图。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论说是选择性的，对凯末尔的转向和反共，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遮蔽。黄志高《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作,但当凯末尔党人地位稳固和战胜希腊人之后,政策发生了变化,渐渐有和协约国妥协的趋势,用各种方法摧残左派。“仍旧又回到大土耳其主义和大回教主义去了……变了军政独裁的统治”,政权也就完全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富豪巨商成为国民运动的中坚。农民的租税却丝毫没有减轻。总之,“一九二二年土耳其战胜希腊之后,土耳其国民运动派的资产阶级性便完全表露出来了,国民大会政府若要巩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有赞助劳动阶级的勇气”<sup>①</sup>。

1925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瞿秋白就此写下了其著名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对戴季陶的反动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在文章中,瞿秋白引用了戴季陶的话“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瞿秋白批评道“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sup>②</sup>这里,瞿秋白是以土耳其革命的不彻底及土耳其国民党(共和人民党)对土耳其共产党的高压政策来类比戴季陶的主张,瞿秋白强调的是,土耳其革命虽然成功了,民族主义虽然恢复和振兴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但土耳其人民依然受压迫,基于此种类比,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主张并不能带来人民的真正解放。这里,土耳其被构建为一个反面教材,成为中共批判国民党人的武器。

凯末尔党人对土耳其左派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了中国革命。罗福惠在论述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既迟又少的原因时,特别谈到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这个论题。罗文指出,苏俄(联)对凯末尔革命给予了道义上、物质上的巨大援助,使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很快取得胜利,但土耳其并没有向苏俄(联)

① 瞿秋白:《国民革命之土耳其》,《新青年》(季刊)1924年第4期,第44~60页,后此文又以署名“秋白”分四期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第2卷第12~15期。

② 此文曾收入1925年9月向导周报社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书。《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196页。

一边倒，反而与苏俄（联）发生高加索的领土争执，并开始迫害共产党人，这些使苏共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即使成功也未必能把这一运动转变或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很可能发生分裂。故1922~1925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持谨慎态度，始终担心他会成为凯末尔第二。<sup>①</sup>逻辑上，共产国际更重视直接援助真正的共产党。

### 三 冷战期间中土形象的相互建构

冷战期间，毛泽东关于土耳其的言论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毛泽东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凯末尔主义进行了批判：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sup>②</sup>

① 罗福惠《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兼论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80~681页。



20世纪50年代末,出于外交上的需要,毛泽东对上述观点做了修正。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记者时明确地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sup>①</sup>

但土耳其毕竟是美国的盟友,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只能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存在。1960年,毛泽东曾说“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sup>②</sup>之流,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将要被人民所推翻。”<sup>③</sup>

从土耳其方面来说,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使土耳其建构了对中国的负面形象。由于土耳其直接派兵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两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相遇,竟然是在朝鲜战场上。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土耳其一直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别是在整个50年代的曼德列斯政府时期,中国政府不断谴责其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路线。在土耳其这方,根据乔达西(Çağdaş Üngör)的研究,土耳其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记者报道和报刊评论,“设定了土耳其人理解东亚国家特别是红色中国的维度”,而且,“通过把中国的军人描写成邪恶之敌、可怜的战俘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幼稚信仰者,这些叙述构建了土耳其人关于这块陌生土地及其人民的长期形象”。<sup>④</sup>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的影响都很大。土耳其的统治精英在冷战期间维持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反共立场。从中国方面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我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01~402页。

② 时任土耳其总理,1960年5月27日在政变中逮捕,次年被判绞刑遭处决。——引者注

③ 《毛泽东说必须结成统一战线战胜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第1版。

④ Çağdaş Üngör,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Turkish Korean War Narratives,” *Turkish Studies*, Vol. 7, No. 3, September 2006, pp. 405-420.

们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左派运动，《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sup>①</sup> 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不了解中国的土耳其人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红色中国的形象。

#### 四 土耳其民族史观下的突厥与中国

现代土耳其人在族源问题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内亚想象，而这个想象既要利用汉文史料予以支撑，同时也必然地与中国发生历史的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它在当代仍然需要重新“想象”和构建历史上中国与突厥的关系。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中土两国领导人见面时，土耳其人习惯说“中土两国人民在2000年前就是邻居”之类的话，<sup>②</sup> 从土耳其的民族史叙事的角度来说，有其合理性。

以最典型的突厥语国家土耳其为例，它的民族主义叙事不仅无法回避还必须着重探讨古代突厥的历史。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土耳其人作为一个讲突厥语的部落所创建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它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必然面临如何重构自身历史的问题，这是东方民族主义的通例。当然，土耳其有其特殊性，如法国学者库伯所言“历史上，从阿尔泰到维也纳，土耳其人所见到的是其祖先在一条绵延的迁徙之路上不断前进。在半路上，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与之相互融合。他们成为伊斯兰教的携带者与传播者，伊斯兰教也给了他们一份中东遗产。以前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后来又到过巴尔干的土耳其人，与这片土地的过去以及在其上生活之人民必定延续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20世纪初便上演了一系列悲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混乱的土地关系（这一关系自身成为历史故事的基础）必然出现一个认同的问题，而在历史教科书里，也有义务面对这个问题。”<sup>③</sup> 笔者在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的研究中曾指出，现代土耳其的民族史观既有一般民族主义史学的政治性和复古性，同时又植根于土耳其民族

① 《坚决支持土耳其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人民日报》1960年5月5日，第1版。

② Barış Adıbelli,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 – Çin İlişkileri*, İstanbul: İQ Kültür Sanat Yayıncılık, 2007, 参见该书扉页中对土耳其和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摘引。

③ É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 – İslam Sentezine*, Tarih Vakfı Yurt Yayınları, 1998, p. 7.

的特殊性。<sup>①</sup> 土耳其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要追溯当代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渊源,它不可能回避追溯到内亚的历史。在库伯看来,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当代土耳其人,他们还有一个被赋予了故乡(anayurt)之名的地方,他们对那里并不熟悉,但那是土耳其人可以时不时在梦中转移思乡之情的起源地,这也是土耳其官方认可的历史叙述。<sup>②</sup> 治古代中亚史的专家弗莱(Richard N. Frye)也曾说“当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居民有两个根源:安纳托利亚和内亚的阿尔泰山区。这两个地方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土耳其人及其文化。”<sup>③</sup>

那么,在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又是如何被表述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民族主义盛期的中国“想象”。笔者说的民族主义盛期指凯末尔主义时代,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它涵盖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土耳其提出了一种“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该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sup>④</sup> 当时,按凯末尔的指导提出并论证这一史观的阿菲特·伊楠(Afet İnan)女士曾概括说:

我们的祖先曾创建了很多伟大的国家,他们同时也是宏伟文明的主人……土耳其国家的真正主人,不是那些在较近历史上迁徙而来者。土耳其人是一个圆头颅的种族,是曾经在安纳托利亚创建了伟大国家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最初的文化故乡是在气候适宜的中亚。后来,气候条件的变化迫使这个会用磨光石器、懂得农业生产和擅长冶炼金属的人群到处迁徙。从中亚出发,他们向东、向南迁徙,向西则散布于里海南北。他们在所到之处定居下来并创建了文明。在有的地方他们成为土著人,在有的地方则与原来的土著居民融合。在欧洲,他们碰到的恰是长头颅人。伊拉克、安纳托利亚、埃及和爱琴海地区的文明,最初都是由中亚的圆头颅人种创造的。我们今天的

① 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三联书店,2011。

② É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 - İslam Sentezine*, p. 9.

③ Richard N. 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8.

④ 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三联书店,2011。

土耳其人也是他们的孩子。阿塔图克的历史观就可以这样概括。<sup>①</sup>

“土耳其史观”讲到从中亚迁出的土耳其人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讲到仍然留在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的活动。将故乡确定在中亚地区后，土耳其史观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突厥人与中国人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亚及迁徙出来的土耳其人，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历史记载中，都主要且首先与中国人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在前述史观的指导下，土耳其的官方历史教科书“论证”了土耳其人如何影响中国文明。“在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人种。中国最早的居民来自两个不同的人种。其中一个是本地人，另一个则是来自一群中亚的、成为高贵阶层的、作为文明创造者和战士的人。实际上，自历史翻开它的第一页以来，中国就持续不断地遭受侵略与攻击，这些攻击总是来自土耳其人。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大批的土耳其人不断地从最古老的国家迁徙到这里来。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今天被称为中国人的数百万人，还保留着单纯的土耳其因素。”“中国的政治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其中第一个皇帝就是伏羲，是伏羲首次把中国组成了一个国家来管理。‘五帝’时代在中国的统治是公元前3000年前。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就进入此地，并定居下来。”<sup>②</sup>他们又用类似的方法来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创立者都是土耳其人，连秦始皇也是土耳其人。在写到汉朝的时候，没有办法证明汉朝皇帝也是土耳其人，他们就把逻辑转移到“中外”关系上，说“中国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国。……中国受到极大的压力和摧残”<sup>③</sup>。“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处于不同的土耳其国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14世纪，一个本土的领袖创建了一个王朝（明朝）。它终结了成吉思汗的国家。”<sup>④</sup>

对于以上史观，我们需要详细地予以解析。在土耳其人的历史叙述中，直到今天，都将匈奴的历史作为突厥或土耳其的历史来对待，而且土耳其人认为匈奴帝国是突厥人建立的最早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说：

① Afet İnan, “Atatürk ve Tarih Tezi,” *Belleten*, Vol. 3, Ankara, 1939.

② *Tarih I*, 原版为 Istanbul Devlet Matbaası, 1932, 最近的第三版为 Istanbul Kaynak Yayınları, 2001, 该书所据为第三版。 *Tarih I*, Istanbul Kaynak Yayınları, 2001, p. 56.

③ *Tarih I*, p. 58.

④ *Tarih I*, p. 58.

“突厥人在很久以前的不同历史时期从中亚迁出，在不同大陆上建立了很多国家，类似地，留在故乡的那些突厥人也在不同时期建立了名称不同的国家。其中所知历史最为古老的就是亚洲匈奴－突厥帝国。”<sup>①</sup>到了21世纪，土耳其人的历史教科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中亚所知最早的有组织的突厥国家是匈奴人建立的。他们是蓝突厥人和回纥人的祖先。匈奴人在公元前3世纪强大起来。匈奴人是其邻居尤其是中国人感到害怕的力量。”<sup>②</sup>

在民族主义极盛时期，“土耳其史观”强调，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那些因干旱而迁徙的土耳其人在东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明，而且为中国文明的发达和进步做出重要贡献。<sup>③</sup>土耳其人赋予匈奴的几个特征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历史悠久、文明、强大且令中国害怕。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强调了匈奴在法律、商业、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先进性，尤其是提到，“中国人从匈奴文明受益良多。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突厥人的”<sup>④</sup>。在21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强调了突厥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不断地发生战争，在文化上，土耳其人将马文化传给中国，并在天崇拜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化。<sup>⑤</sup>

简单总结一下，在土耳其人的历史观中，不只将中国汉文史籍所重点记载的东突厥帝国作为整个突厥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且还将在汉文史籍中被多样化的突厥起源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处理，制造了从匈奴到拓跋再到突厥、回纥的叙事线索，从而将土耳其的民族历史直接上溯到内亚历史上的匈奴人，由此，匈奴人也就成了匈奴－突厥人，这些内亚游牧民族长期竞争的对象就是中国的中原王朝。因此，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它总是要首先处理中国，在其脉络中，中国成为经常被攻击的只有防御能力的对象，而且在文明上，中国也向土耳其人的不同祖先学得了很多。从这个例子也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民族历史难免都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那么，对于相似的问题，中国人又是怎么看的呢？罗新教授已经指出，中

① *Tarih 1*, p. 63.

② *Tarih, Lise -1*, p. 39.

③ *Tarih 1*, p. 28.

④ *Tarih 1*, p. 66.

⑤ *Tarih, Lise -1*, p. 62.

国历史记载的突厥之范畴非常狭窄，与国际上尤其是土耳其将突厥泛化的倾向不同，中国倾向于将突厥做专门化的处理。薛宗正指出，突厥是一种民族专称，而非民族泛称，“突厥”一词的概念应严格限定在儒尼碑文中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它是一个历史地产生、历史地消亡的古代民族。“六至八世纪乃突厥民族最为活跃的时期，八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都已断绝。……阿史那氏统率的突厥残部虽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不复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至迟于十一世纪，东、西两大支突厥部落相继消失了。其后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称，与之混血，开始了新的历史航程。”<sup>①</sup>

薛宗正曾批评了国外学者的上述观点，他指出，西方学者的共同弱点是，“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了历史学的劣势，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黯于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与突厥史研究范围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其明确限定的历史古族名称，而是泛指西至鞑靼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变成连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内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共名。这一理解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应盲从，而应批判地对待”<sup>②</sup>。薛氏指出，突厥民族与突厥语族是有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而西方学者却通过所谓的“突厥学”研究（薛氏不承认突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混淆了这两个范畴，“以语言学研究顶替和取代了历史学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语族诸族皆为突厥的后裔，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错误结论”，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来源，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一直利用突厥学歪曲历史。实际上，“历史上的突厥民族同现今世界上的突厥语族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并非后者的共同祖先，后者亦非前者的直系后裔，二者的联系只不过是语言族属关系相近而已”。<sup>③</sup>

事实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并不直接的史观交锋，而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明确的，即关于泛突厥主义的问题。<sup>④</sup>

① 薛宗正 《突厥史》，第 698 页。

② 薛宗正 《突厥史》，第 23 ~ 24 页。

③ 薛宗正 《突厥史》，第 25 ~ 29 页。

④ 这个问题，本文无法详细展开，可以参见管涛 《从历史的角度看“双泛”》，载《大观》（第五辑），2011。

## 五 21世纪中国与土耳其的认知建构

冷战后,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在经贸领域,土耳其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庞大人口的市场价值,当代土耳其人对中国的想象与此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实行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中国也在实行改革开放。土耳其自然会注意到中国,尤其是注意到中国巨大的市场价值,这方面最常被引用的是1980年军人政变后当上土耳其总统的凯南·艾弗伦将军的话“如果每个中国人买我们一个橘子,我们就富了。”<sup>①</sup>这句话一直被作为象征性的名言,表明当代土耳其人对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兴趣。

21世纪,土耳其人关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的认知从希望中国人购买更多的土耳其商品转移到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土耳其旅游,土耳其有关方面希望以此来平衡中土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2007年的时候,土耳其外贸部部长科萨德·图兹曼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每年都有4000万人到海外旅游,到土耳其达20万人左右肯定是没有问题。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国人到土耳其旅游,在土耳其多花钱,这样我们才能赚更多的钱”<sup>②</sup>。

在土耳其还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即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国是一个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日益提高和扩大其影响的正在崛起的力量。土耳其的观察家们几乎没有人否定这些看法。库泰·卡拉扎(Kutay Karaca)断言:“唯一能够勇敢地挑战和反抗美国最近所形成的单边世界秩序的国家,就是中国了。”麦赫迈特·厄余特楚(Mehmet Öğütçü)认为,对土耳其而言,考虑到中国今日的地位和其未来的潜力,中国与美国同等重要,可能比美国、欧盟和日本更为重要。对德尼兹·阿若保安(Deniz Ülke Arıboğan)来说,“如果(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继续坚持维持一种亲欧美路线,而不考虑远东作为一个具有未来国际重要性的地区的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早在1996年,哈斯雷特·

① “Türkiye - Çin Halk Cumhuriyeti Ekonomik İlişkileri İçin Bir Yol Haritası,” *Asya Pasifik’ te Gündem*, Bahçeşehir Üniversitesi: Asya Pasifik Araştırmaları ve Uygulama Merkezi, Sayı 7, August 6, 2007.

② 《访土耳其代表团团长、外贸部部长科萨德·图兹曼中土合作前景广阔》, [http://www.fjsen.com/misc/2007-09/10/content\\_317363.htm](http://www.fjsen.com/misc/2007-09/10/content_317363.htm), 查阅时间: 2017年4月30日。

乔马克 (Hasret Çomak) 就说 “提升与这个到 2025 年有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 (中国) 的合作, 并提供新的合作机遇, 这对土耳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sup>①</sup> 有的土耳其战略观察家认为, 为了维护自身在中亚的利益, 土耳其必须接近上合组织, 并且与之发展良好的关系。为此, 土耳其必须向中国表明其合作的诚意。面对中国当下最迫切的需要, 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就是其东西方向的桥梁地位和反恐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后一个方面, 根据这位土耳其观察家的看法, 土耳其需要与中国合作以打击困扰中国的 “东突” 恐怖主义问题, 唯其如此, 土耳其才能在上合组织中施加重要影响, 并取得中国在其他方面对土耳其的谅解。<sup>②</sup>

当然也有土耳其人对中国持强硬态度。首先, 强硬派认为, 那些搞妥协的人永远不理解经济民族主义。强硬派认为, 对中国而言, 土耳其只是一个通往欧洲共同体的跳板 (sıçrama tahtası), 那才是一个有着巨大机会的市场, 所以, 他们认为, “那种说 ‘中国已经准备好购买我们所卖的各种东西, 我们不能失去中国’ 的论调只是无知和毫无成果的假定而已”。其次, 强硬派认为, 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 对中国的 “东突” 问题置之不理, “是最不合逻辑的理由”, 因为, 他们认为, 中国在 60 年代对土国内左派的支持是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sup>③</sup>

今天土耳其人的中国想象受到三个因素影响。首先, 是 “泛突厥主义” (Pan-Turkism) 这个老问题。土耳其共和国 (Türkiye) 这个国家的词根是 “turk”, 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 “突厥”, 有的时候翻译成 “土耳其”。一些自 19 世纪末以来就认同 “突厥” 的不同族群的人就把土耳其视为自己的祖国, 当时在土耳其的一些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抱有这样一种情感。泛突厥主义的一个影响就是能让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认为自身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按照土耳其内务部的一个说法, 它境内有近 30 万维吾尔族人, 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先前移民的后裔, 土耳其自视为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的领袖, 土耳其上上下下

① Eyüp Ersoy, “Turkey - China Political Relations,” <http://www.chinacircle.biz/turkey-china-political-relations/>.

② Yunus Akgür-Ertan Çakıroğlu, “Şanghay İş Birliği Örgütü,” *Köksav E-Bülten*, Apr. 29, 2008.

③ Nuraniye Hidayet Ekrem, “Türk - Çin İlişkilerinin Gelişmesi,” in *Uzak Doğu - Pasifik Araştırmaları Masası*, August 22, 2006; Necip Hablemitoğlu, “Türkiye - Çin İlişkilerinde Gözardı Edilen Bir Boyut: Hükümet-Çin-Doğu Türkistan,” <http://www.hakimiyetimilliyet.org/index.php?news=610>.



下都普遍称中国的新疆为“东突厥斯坦”(Dogu Turkistan),这个问题在两国之间当然容易形成敏感的症结,不管是哪个党派,都很难忽视这个在土国有一定民间基础的问题。历史上那种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东突厥国家的妄想,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当真了,但是,它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特定的时刻它自然会表现出其政治性来,比如,在经常出现的反华问题上就是如此。

其次,是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的问题。全世界有十几亿穆斯林人口,他们信奉一个神安拉(Allah, الله),读同一本《古兰经》,朝一个方向礼拜,这其中自然有一种朴素的“同胞之情”(brotherhood),这种情感并不复杂,不难理解。它还被发展为一种叫作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至少从19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有意识地运用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宗教来团结广大的穆斯林,二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在艾尔多安时代,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尤其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很多中国人习惯性地将其视为一个东方国家,从而容易忽视土耳其现代历史的西方性一面。尤其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发展,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当然也让很多人瞧不上土耳其这个被一些网友称为所谓“火鸡国”的西亚国家。土耳其文明的西方性,不只是土耳其人的自我宣传,或者仅仅表现为要加入欧盟的种种不成功的努力。土耳其当代著名的战略家、前外交部部长、前总理阿赫麦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曾撰文谈北约对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北约之重要性不是因为两大阵营的冷战,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世界,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完全地实现自由,北约就有存在的必要;所以,那种说冷战结束了北约就该解散的观点是错误的,土耳其在北约里面,不只是安全考虑或者战略选择,更是价值选择。现在土耳其与欧盟、北约、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多,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质变。土耳其领导人喜欢用上合组织来平衡其与西方的关系,但在笔者看来,那主要还是一种宣传的需要,在这种宣传里,中国被建构成一个可替代的选项,但在实际中并非如此。土耳其的价值既是伊斯兰的,也有很多的成分是西方的。它与西方一样关注所谓的宗教自由、少数民族问题,这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土耳其人会攻击中国，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会攻击土耳其，其理一也！<sup>①</sup>

简言之，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现代性，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着当代土耳其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

中国人则更多地从西北边疆的安全角度关注土耳其，接续的其实是 19 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给清朝大臣留下的干涉主义印象，至今未变。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分裂势力沿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发展。在国内，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潜藏在人民政权内部的“东突”分裂分子，经过多次清理和打击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该势力基本处于较为平静状态。流窜在国外的“东突”分裂势力，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逐渐在土耳其等地区形成多个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后，这些分裂组织又开始向国内渗透。20 世纪 80 年代，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国内逐渐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频繁制造事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东突”分裂势力内外勾结，其活动进入一个活跃期。境外存在四股分裂势力，其中之一即西亚地区（土耳其）的艾沙集团及其新生力量。<sup>②</sup>

当代，提起土耳其中国人会想到很多东西，包括古代的突厥和当代的新疆问题，当然也包括土耳其足球、肚皮舞。在信息化的时代，这些元素的影响会呈现共时性，使得中国人对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与想象呈现更加多元的特性。但不论何时，自古以来，中国在突厥/土耳其问题上的观念，当然也包括土耳其人关于中国的观念，都难免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

今天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又开始了重新“打量”彼此的过程。今天谈论中土关系，可以回到历史。历史是今天的镜子，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因为文明、技术和地理的原因而远离彼此，但是 1991 年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土之间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开始的时候。进入 21 世纪，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土耳其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伙伴国家，尤其是在讲突厥语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中国与土耳其的合作有着较大空间。

① 管涛等著《重新发现土耳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第 53～58 页。

② 以上有关“东突”分裂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论述，参见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前言”。

##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Zan Tao*

**Abstract:** Turkey is a country along the silk roa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 Turkey and China carried 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each other , and left precious silk road heritage. Although China and Turkey has been away from each other for reasons of civilization , technology and geography ,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is still important for the current cognitive construction. As “The Belt and Road” is raised , Turkey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ner country for China.

**Keywords:** China-Turkey Relation; Cognitive Construction; The Belt and Road